

自由的体系

——费希特哲学读本

梁志学 选编



商务印书馆

自由的体系

——费希特哲学读本

梁志学 选编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的体系/梁志学选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ISBN 978-7-100-05662-5

I. 自… II. 梁… III. 费希特, J. G. (1762~1814)—
哲学思想—文集 IV. B51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6534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自由的体系

——费希特哲学读本

梁志学 选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662-5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27.00 元

导 言

我的体系是第一个自由体系；正像法兰西民族使人摆脱了外部枷锁一样，我的体系使人摆脱了自在之物、外部影响的枷锁，在自己的第一原理中把人视为独立不倚的存在者。——《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2卷第298页。

在德国古典唯心论发展史中，费希特的先验哲学是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对欧洲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提供了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所以，在评价费希特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时，马克思说他是一位思想巨人，恩格斯说我们社会主义者为继承了他而感到骄傲^①。但这个体系是怎样形成的，它包含着哪些基本内容，它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是在本书问世之际，我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向读者回答的问题。

费希特的生平简历

费希特曾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1956年，第15页；第19卷，北京1963年，第347页。

^② 《费希特全集》，第Ⅰ辑第4卷，斯图加特1970年，第195页。

这句话对于了解他的人格和学问,也完全适用。所以,我们首先想从他生活的整个历程谈起。

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 1762 年 5 月 19 日出生于德国劳齐茨地区的一个贫穷乡村。他出身寒微,在童年时就开始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以协助父母维持家计。他从小了解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知道他们如何被剥削与受压迫,知道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辛,因而很自然地形成了憎恨特权阶层的心理。

他 9 岁的时候,邻村的一位慈善为怀的乡绅发现他颇有天赋,记性极强,遂决定资助他接受正规教育。但这位乡绅英年早逝,他在 1784 年上大学四年级时,已经不再能得到遗嘱中规定的资助;这样,他便离开了大学校园,以做家庭教师糊口。虽然他为继续完成学业,做过一些谋求资助的努力,但都毫无结果,而只有从事这个没有生活保障的职业。

1788 年秋天,费希特经人介绍,赴瑞士苏黎世当家庭教师。在这里,他大量研读了那些给法国革命作过舆论准备的著作,尤其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并对 1789 年爆发的这场革命有了正确、深入的理解;在这里,他结识了狂飙运动的宗教界代表人物约·卡·拉法特和车辆制造商、市政厅议员约·哈·拉恩,并与拉恩的女儿玛丽·约翰娜相爱,以至订婚。但他与学童父母的关系越来越不融洽,最后发展到了解除聘约的地步。

1790 年 5 月费希特抱着致力于启蒙事业的美好愿望,返回了莱比锡;他计划办一份刊物,从事写作。但在德国当时那种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条件下,他这个无名小辈的这样一种宏图根本无法施展。为了谋生,他依然不得不重操旧业。然而这时出现了一件构成他整个生活的转折点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学生请他讲授康德哲学,他以令人惊奇的速度读完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

断力批判》，抛弃了他以往信奉的莱布尼茨的决定论，而走上了研究先验哲学的道路。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不仅使他的精神得到了升华，使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而且使他认识到先验哲学在改变腐败的旧社会中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把研究这样的哲学选定为自己长期的课题。

直到1791年3月为止，费希特都在忙于写一部诠释《判断力批判》的著作。但他还没有完成它，他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了。经友人推荐，他赴华沙担任一个伯爵家庭中的教师。不过他在这里待的时间极短，因为伯爵夫人嫌他的鞠躬礼行得不够文雅，缺乏法国派头，说他不配担任教育她的儿子的职务。费希特对于这种侮辱非常气愤，决意依法控告。伯爵夫人害怕事态扩大，经过中间人的斡旋，满足了费希特为维护自己的人格而提出的赔偿要求。

1791年7月1日，费希特为了结识德国哲学革命的开创者而到达柯尼斯堡。他拜访了康德，但康德并没有注意到他追求真理的热情；他旁听了康德的讲课，但他感到没有满足自己的期望。为了对康德作郑重访问，他蹲在一家破烂不堪的小客栈里，奋笔疾书，写出《试评一切天启》，把它作为拜谒的介绍信，寄给了康德。康德收到手稿后发现，这位青年哲学家表述的正是自己的想法，而文笔之流畅又是自己所缺少的，于是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不仅如此，在费希特的生活随后再次陷于困顿境地时，康德还一方面托人给他在但泽地区的克罗考夫谋求到了家庭教师职业，另一方面托人把这部手稿卖给了出版商，帮助他渡过难关。

《试评一切天启》出版于1792年复活节。可是在最初发行的一批书上，未印有作者的姓名和前言，这就使广大读者以为，它是出自康德的手笔，他也许是为了躲避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才这么做的吧！康德得知这类传闻以后，很快在6月31日《文汇报》上公开声明：

“《试评一切天启》的真正作者是神学候补生费希特，他原籍劳齐茨，去年顺便到柯尼斯堡作过短期访问，现在担任西普鲁士克罗考夫城克罗考夫公爵的家庭教师。”结果，费希特由此名声大震，获得了他在德国哲学界的生存权。

在但泽期间，费希特不仅继续研究康德哲学，而且把它应用于评论社会生活，撰写政论著作。针对普鲁士司法与宗教大臣约·克·冯·沃尔纳 1788 年颁布宗教敕令与书报检查敕令以来，惩办发表异议人士的高压手段，他于 1792 年底写成了《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1793 年复活节)，阐明思想自由是社会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和不容压制的天赋人权，奉劝当局改弦易辙；针对法兰西人民处决路易十六以后，反对法国革命的言论在德国甚嚣尘上的气氛，他于 1793 年春写成了《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头一部分(1793 年 5 月)，论证了这场大革命合理性。虽然这两部论著都是匿名发表的，但读者还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得知它们出自费希特之手。

1793 年 6 月，费希特又到达苏黎世。他用整个夏季时间，完成了《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后一部分(1794 年 2 月)。10 月，与约翰娜正式结婚，在瑞士作短期蜜月旅行。接着，就大力研究先验哲学。他于 12 月底写出了对于怀疑主义者戈·恩·舒尔策《埃奈西德穆》的评论，第一次提出知识学的最高原理。他于 1794 年 1 月完成了《对基本哲学的独自沉思》，并开始撰写《实践哲学》，确立了他的知识学的全部要点。这时，魏玛政府根据歌德的推荐，来函邀请他赴耶拿大学，以接任决定到基尔大学就职的赖因霍尔德即将留下的教席。费希特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在离开苏黎世以前，他又完成了两项工作。一项是从 2 月中旬开始，4 月下旬截止，在以拉法特为首的友人当中讲解了他刚刚才形成的知识学；另一项是在 4 月中旬完

成了《论知识学的概念》(1794年5月),以期作为他的哲学纲领,在他就任前公布于耶拿。

费希特于1794年5月18日到达魏玛,拜访了歌德、维兰德与魏玛政府教育大臣克·戈·福格特,并于当晚抵达耶拿。他在那里拜访了威·冯·洪堡等著名学者,把业已出版的《论知识学的概念》寄送给了歌德与席勒、康德与雅可比等人。大学当局在他开讲之前就授予他博士称号。从5月23日开始,他作了《论学者的使命》的公开演讲。这些演讲的崭新内容和独创精神,他的滔滔不绝的雄辩才能,以及他对自由事业的高度热忱,以极大的魅力吸引了大学的全部年轻人。这些演讲的影响超出了大学讲坛,一些知名学者力求与他交往,一些大学教授希望了解他的体系;一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所作的学术报告,顿时传遍了整个德国知识界,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

同年8月,费希特的夫人约翰娜和已届耄耋之年的岳父也来到耶拿。这位生活坎坷的哲学家经过几年的漂泊之后,总算建立了一个安居乐业的家庭。他给自己拟订了一个计划,那就是要尽快完成和明确表述自己的体系。第一,1794年夏季学期,他讲授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4(1794年),1794至1795年冬季学期,他讲授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5—11(1795年),从而为建立体系确定了原则;而且在随后对这次阐述感到不满意时,又讲授了《知识学新说》,做了第二次阐述。第二,以知识学为原则,他从1795至1796年冬季学期开始,讲授过四轮《自然法权基础》(1796年),建立了作为体系的一个实践哲学部门的法权哲学。第三,同样以知识学为原则,他从1797年夏季学期开始,讲授过三轮《伦理学体系》(1798年),建立了作为体系的另一实践哲学部门的道德哲学。此外,费希特还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发表过不少论文,批评某些遇到的错误观点,而发挥自己的思想体系。

费希特这个计划的实现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当他 1794 年 5 月刚登上讲坛,作公开演讲的时候,就有人向宫廷告密,说他向听众预言,再过二十年或三十年欧洲将不再有国王或君主。歌德把他邀请到魏玛,让他与教育大臣福格特面谈,才消除了当局对他的疑虑。1794 至 1795 年冬季学期,他把自己的公开演讲安排在星期日上午不影响祈祷仪式的时刻,遭到了教会的控告,说他企图在大众崇拜上帝的时间兜售对理性的崇拜,使王冠失去宗教祭坛的庇护。几经周折,魏玛政府才裁定费希特无罪,但要他的演讲改在星期日下午进行。费希特深知,这类封建卫道士手中没有真理,在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对付一个著作家时,他们就恳求当局采用行政手段,弥补他们的论据的破产。他的这个看法不久就得到了验证。1798 年 10 月他发表了“关于我们信仰上帝统治世界的根据”的文章,它本来是纠正有人对上帝存在持有的怀疑主义论点的,但教会指控他宣传无神论,要求政府当局严加惩办。费希特在同事们的支持下,呼吁、辩护和斡旋了将近半年,都未能维护住自己本应享有的学术自由的权利;当他在给福格特写的信中表示,如果问题得不到合法解决,他将辞去职务时,魏玛政府当局便顺水推舟,解除了他的教职。这样,费希特在耶拿建立其体系的过程也就中断了。

费希特被驱逐出耶拿大学以后,处境十分艰难。封建卫道士们想方设法打击他,德国其他各邦政府也对他严加防范。正在这个时候,普鲁士政治家克·威·冯·道姆到耶拿旅行,对他表示同情,私下建议他转到柏林,并保证他在那里不会遇到麻烦。在与当时寓居柏林的弗·施莱格尔通讯商量以后,他决定自己先到那里访问,看结果如何再定。

1799 年 7 月 3 日,费希特本来就像一个普通旅行者那样,通过关卡的检查,到达了柏林,但这在柏林当局看来却是一种重要政治行

动。普鲁士政府讨论了这一情况,决定对这个可疑的来人严加监视。警察出现在他身旁,对他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盘问。在饱尝了魏玛政府的制裁以后,他又不得不生活在普鲁士政府的管制之下。无论在社会活动中,还是在著述活动中,他都很注意自己的言论,而不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他在这时撰写的《人的使命》(1800年)里,把人的最高天职定为奔向超凡世界,去过极乐生活,这反映了所谓无神论之争在他心灵深处留下的创伤,反映了被压迫生灵发出的叹息。他的这种表现打消了普鲁士政府对他的怀疑。他过去的一位熟人卡·弗·贝伊梅作为普鲁士内阁枢密顾问明确地向他表示,他如果愿意在此定居,不仅不会遇到麻烦,而且肯定会受到尊重。这样,费希特就下定决心,于1800年3月举家迁到了柏林。

从1800年10月开始,费希特对知识学的不断修改与重新阐述,取得了日益明显的进展。就内容的变化而言,他1804年讲授的知识学已经不再以自我作为最高原理,而是以理念作为最高原理;就影响的扩大而言,他的知识学演讲博得了越来越多的听众的欢迎,以至听讲者不仅有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也还有许多达官贵人和外国使臣,而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曾经为费希特维持清寒的家庭生活提供过支持。

在这样大力修改知识学以前,费希特结合当时关于禁止外国商品输入和取消国内贸易壁垒的讨论,写出了《锁闭的商业国》(1800年),作为他的《自然法权基础》的续篇。这部书中的各项建议虽然未被当局采纳,但它却构成了第一个计划经济理论模式。在知识学发生重大变化以后,费希特完成了三部相互关联的论著。其一,在普鲁士大臣卡·奥·冯·哈登贝格的支持下,他于1804年10月至1805年3月在柏林科学院礼堂讲了《现时代的根本特点》(1806年);他在这本历史哲学著作中,从作为理念的宇宙蓝图出发,刻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各个必经阶段,批判了他那个恶贯满盈的时代。其二,

哈登贝格提议,他于1805年被聘任为爱尔朗根大学教授,并于6月至8月在那里讲了《关于学者的本质》(1806年),说明理念构成学者的本质,规定了各种学者的使命,批评了贪图个人生活享受的庸俗思想。其三,他于1806年1月至3月在柏林科学院礼堂讲了《极乐生活指南》(1806年),把业已改变的知识学最高原理与约翰福音派的上帝概念统一起来,完成了他的宗教哲学。在他看来,这本著作更为重要,因为它居于三部论著构成的整体的顶点。

在拿破仑把保卫法国革命的正义战争转变为侵略欧洲其他民族的非正义战争的时候,费希特认识到,拿破仑已经不再是法国革命的原则的传播者,而是这场革命的成果的篡夺者,犹如一只翱翔在欧洲上空,寻取猎物的秃鹰。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与奥尔斯特惨败以后,费希特旋即前往柯尼斯堡避难,在那里被任命为柯尼斯堡大学教授,继续讲授知识学。1807年6月,在法国军队即将战胜俄国军队的弗里德兰战役前夕,他又辗转到哥本哈根。8月,在普鲁士与法国休战,但还没有签订和约的时候,他便毅然返回了柏林,并且不顾法国驻军可能给自己造成的生命危险,从12月到1808年3月在柏林科学院礼堂勇敢地发表了振兴德意志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演讲,即名垂青史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8年),它是《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的续篇。

虽然在1808年与1809年费希特已经积劳成疾,不得不长期疗养,但这位不知疲倦的哲学家并未中断演讲,而且为筹建柏林大学拟定了具体草案。1810年柏林大学成立,他被任命为哲学系系主任;1811年8月当选为校长,为维护学术自由和大学尊严呕心沥血,克服障碍,尽了自己的职责。他这时清醒地意识到,担任校长职务对自己是无益的,他应该在自己业已开拓的学术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所以不久就辞去了这个职务,而把精力投入了研究与教学。他讲授了《意

识的事实》、《先验逻辑》、《法权学说》、《知识学》和《国家学说》，再次取得了可喜的丰硕成果。

1813年民族解放战争蓬勃展开，他决意投笔从戎，申请做激励士气的随军宣讲员。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他又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笔现金捐献给了国家。他不仅鼓励青年学生参加反击拿破仑的战争，而且拐着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双腿，参加了后备役军训。一俟操练结束，他连军装都不换，便立刻出现在讲坛上，作振奋人心的爱国演讲。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政治热情，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德国人民，尤其是负有民族复兴重任的年轻人。但极其不幸的是，在莱比锡会战后的凯旋进军中，在德国人民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的欢呼声中，这位为祖国人民鞠躬尽瘁的哲学家由于受到约翰娜从接纳伤员的医院带来的病毒感染，于1814年1月29日溘然与世长辞，而未能能在滑铁卢战役后的德国再做出新的奉献。

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

青年费希特从1790年8月开始研究康德，到1794年5月在耶拿大学任教，是他进行一系列富有内容的创作，形成自己特有的思想体系的时期，而对他的体系的形成具有直接决定作用的是康德哲学和法国革命。当时，康德几乎变成了德国唯一的哲学话题，康德发起的哲学革命正像哥白尼让太阳静止下来，而让地球绕着太阳旋转一样，是要让理性这个太阳静止下来，而让现象世界绕着理性旋转。德国出版的无数哲学著作都在评论康德，有的表示拥护，有的表示反对，但这场哲学革命的结局如何，还难以预料。与此同时，在莱茵河的彼岸，一场震撼世界的政治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攻克巴士底狱的法国人民正在高举着《人权宣言》这个反封建的纲领，投入制定

宪法和选举代表人民主权的政府的斗争,要求废除贵族特权和没收教会财产,把革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费希特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出发,回答了怀疑主义者舒尔茨的挑战,否定了赖因霍尔德基本哲学的第一原理,确立了自己的知识学,同时,以理性主义为依据,肩负着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对现实生活提出的法权与道德、国家与革命问题作出了严肃认真和发人深省的回答,从而使德国哲学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就知识学的形成来说,费希特经历了一个继承和推进康德的过程。他最初钻研和讲解的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然而随后不久,就很快熟悉了《实践理性批判》,并且极其重视康德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论点。他给他的朋友写信说,“康德哲学,特别是它的道德哲学部分——但这个部分,如果不先读《纯粹理性批判》,是无法理解的——给予人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影响,尤其是它在我的整个思维方式中产生的革命,真是难以言表。我应该向您承认,我现在由衷地相信人是自由的,并且看到,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职责、美德和整个道德才可能成立”;而且“我还进而明显地看到,那种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必然性的原理给社会造成了非常有害的结果,所谓的上等阶层的大量道德败坏现象即源出于此”^①。在费希特看来,那种主张从物质到精神的独断论体系会得出一切不合理的现实都有其不可改变的必然性的结论;反之,康德主张的从精神到物质的先验哲学则会得出人有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实的合法权利的结论,因此,他从进入哲学领域之日起,就是依照先验哲学的方向从事著述活动的。

康德当时的拥护者们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但都认为他的

^① 《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1卷,斯图加特1968年,第193—194页。

哲学作为一个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位仿佛是由康德确认的批判哲学解释者，即赖因霍尔德，察觉《判断力批判》并未填平从客观到主观的理论理性与从主观到客观的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因而在这里认识能力、情感能力与欲求能力是单纯并列的。为了克服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赖因霍尔德在他的《关于基本哲学的原理》（1790年）中制定了他的基本哲学；他认为，这一哲学的基础是一个绝对第一的、由自己彻底规定自己的和普遍有效的意识命题，从这个命题出发，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其他一切哲学命题，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起来。费希特在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实践哲学问题时，并没有对赖因霍尔德的这个尝试加以细究，也没有感到它与自己强调实践理性会有什么矛盾。只有当他读到舒尔策向自己崇拜的康德与赖因霍尔德发出挑战的《埃奈西德穆》（1792年）的时候，他才重新审读了赖因霍尔德的著作，经过反复研究，回答了舒尔策的批评，找到了真正发展康德哲学的正确途径。

费希特在他完成的《评〈埃奈西德穆〉》（1794年2月）里，首先研究了舒尔策对赖因霍尔德的批评。在他看来，赖因霍尔德把意识命题作为先验命题置于哲学体系之首，是有片面性的，因为意识命题作为经验命题也会得到证明；同样，舒尔策把意识命题当作经验命题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理解这个命题的人并不认为它单纯有经验有效性，而认为它也具有从另一原理推导出来的先验性。所以，舒尔策提出的一切异议，就它们被视为反对意识命题的先验性而言，是毫无根据的，但就它们击中了这个作为哲学体系第一原理的命题而言，却推动了从事哲学思考的理性。他证明意识命题是表述事实的理论理性定理，它是从实践理性原理推演出来的，而只有这样的原理才是哲学的最高原理；他说，“如果允许冒昧地作出一个在这里既不能加以解释，也不能加以证明的论断，这样一个原理则恰好一定不是表述事

实,而是确实能表述一种本原行动”^①。这样,他就为建立知识学提出了第一原理,在正确地发展批判哲学中迈出了一个决定性步伐。

然后,费希特在这篇书评里研究了舒尔策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批评。在舒尔策看来,从精神中推演出我们认识中的普遍必然的东西,较之从我们之外的对象对我们的作用方式推演出它们,丝毫不会使它们的存在更加容易理解。费希特指出,这是在解决认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问题上提出的一种从外到内过渡的要求,它是以经验主义为依据,克服康德的主观与客观分离的二元论的尝试,但这样的尝试应该加以否定,因为它假定了一个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对象,这恰恰是用自在之物拨弄独断论的陈腐调言。费希特认为,康德哲学在本质上是先验主义,必须在我们精神的范围内,以一个唯一的原理为基础,发展为完备的体系。他写道,“康德哲学本身就其内容而言,依然坚实如故,但是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把各种材料整理成为一个密切关联、坚不可摧的整体。但愿独立思考的人们受到这个信念本身的鼓舞,各就各位,各尽所能,为达到这个崇高的目标作出贡献吧!”^②

在找到体系的第一原理以后,知识学的形成是相当迅速的。在《对基本哲学的独自沉思》里,费希特制定了知识学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它的理论知识部分的基础;在《实践哲学》里,他又进而奠定了它的实践知识部分的基础,从而使他的知识学具有了十分明显的轮廓。正是依据这样的研究成果,他在苏黎世的演讲里才把知识学作为关于一般科学的科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正是依据这样的研究成果,他在《论知识学的概念》里才向耶拿的听众预告了这门科学的性

①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2卷,斯图加特1965年,第46页。

②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2卷,斯图加特1965年,第67页。

质、它的基本原理和它的组成部分,而他亟须完成的任务就是写出一部专著,阐述他业已形成的知识学。

就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来说,费希特经历了一个批判地吸收天赋人权论和由此得出的社会契约论的过程。在《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里,费希特根据天赋人权论,论证了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是不容压制的天赋人权,说明这样一些权利是不可出让的和不能放弃的,否则,人性就会遭到毁灭,人就会被降低到动物的地位;同时,他又论证了人们彼此放弃可以出让的权利,才签订了社会契约,说明君主的权利是由社会委托的,而社会决不可能将人的不可出让的权利委托给君主,因为人们在组成社会时出让的只能是见诸外在行动的权利,而决不可能是见诸内心意向的权利。费希特向人民呼吁道,“民众,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献出,只有思想自由不能!”^①另一方面,费希特向君主们指出,你们与民众也都生活在精神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你们与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你们不仅无权压制思想自由,而且必须尊重对真理的探索,促进真理的传播。在这里,费希特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倾向于洛克那种为君主立宪作论证的社会契约论,希望社会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向前发展。

但是,随着法国革命发展到雅各宾专政阶段,他的认识迅速得到了提高。经过认真的研究,他在《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中得出结论说,“在我看来,法国革命对于全人类都是重要的”,“这场革命正是一幅关于人的权利和人的价值这个伟大课题的瑰丽画卷”^②。得出这个结论的理论前提是他从康德继承来的先验自我原理和他在

①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卷,斯图加特1964年,第170页。

②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卷,斯图加特1964年,第203页。

批判地吸收天赋人权论的基础上制定的社会概念。在费希特的视野里,组成社会系统的元素虽然也是孤立的,但不是社会契约论假定的那种生活在现象世界中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精神世界中的先验自我。当先验自我也同时作为感性自我进入作为现象世界的人类社会的时候,这样一些自我最初都生活在天赋权利领域里。费希特认为,以往所谓的自然状态,不论是霍布斯讲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还是卢梭讲的没有私产和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已经组成社会的天赋权利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离群索居,而是人们都过着共同的生活,有相互的权利与义务,服从于道德规律。随后,人们在处理财产、劳务等经济关系时,就缔结了一般契约,共同生活在从天赋权利领域划分出来的一般契约领域里。费希特认为,在这个领域里人们通过劳动,把自己的形式赋予对象,从而成为自己的劳动产物的真正所有者;他由此得出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结论,论证了法国革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为了监督一般契约的双方践约,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权益,人民与一个人或一些人代表的国家又缔结了特殊契约,共同生活在从一般契约领域划分出来的特殊契约领域里。费希特认为,在这个领域里君主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如果国家压迫人民,人民就有权修改特殊契约或退出特殊契约,从而论证了法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和建立民主政体的合理性。在这里,费希特既采纳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又克服了他们这些社会契约论者把国家与社会混同起来的错误观点。不仅如此,费希特还接近于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真理,他写道,“我们已经证明,国家本身是靠社会才存在的。国家本身应该把它本当归因于社会的东西归因于社会;我们即使没有国家作中介,也会与社会相容”^①。这些观

^①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卷,斯图加特1964年,第288页。